

時空越境，國族療傷： 日治初始梁子嘉《日東遊草》的旅行敘述^{*}

楊雅惠^{**}

（收稿日期：102 年 7 月 10 日；接受刊登日期：102 年 10 月 20 日）

提要

本文探討日治初始臺灣古典詩人梁子嘉《日東遊草》的旅行敘述。其詩對於日本的港市風光、歷史文明，多所著墨——無論抒情想像與審美觀照，或詠史感時而微言批判，從中，我們都可考察漢文化圈中的古典詩人對東亞新帝國日本，在文化上的辨異與認同、在情感上的憧憬與迷離。其越境旅行時間在於中日甲午戰後、臺灣乙未之變的隔年，更突顯了國族療傷的行動意義。因此我們兼而思索：梁子嘉之異地遊歷，與守在臺灣的棄地遺民、內渡避亂的流亡移民，在地理意象、空間意識與時間意識上有何異同？梁子嘉又如何藉由越境之旅，省思日本與中國、臺灣的糾葛關係，以對於挫敗的國族傷痕進行療治。

關鍵詞：梁子嘉、日東遊草、旅行敘述、日治時期、療傷

^{*} 本文發表於 2011 年 11 月 25 日「旅行與旅行敘事」國際學術討論會，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主辦，承主持人施懿琳教授惠示卓見。今復承許俊雅教授及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中日甲午戰爭，對於以大清帝國為政體的中華民族是一大挫敗；乙未割臺，對於隸屬清朝的臺灣，更是天崩地裂的巨變。在武裝抗日、浴血鏖戰的創傷之後，古典文人空懷憂忿，卻也只能在詩文中從事傷痕書寫。如洪棄生的詩代表留在臺灣「棄地遺民」之哀悼痛歌，丘逢甲、林朝崧的詩則代表內渡避亂的流亡傷離書寫。這種喪亂之痛的抒發，從精神分析學說來考察，是因現實上空前的創傷，使主體極度受驚，強力影響了有機體後來的能量運作方式。¹而其所形成的「傷痕」，在文學中乃構成了隱喻的表意系統，體現了被割離、被斷傷的痛苦遭遇。因此乙未割臺這劃時代的事件，社會主流的傳統文人不免都受此巨變刺激，頓升的憂傷忿恨能量，在往後幾年間不斷地迴盪在臺灣整體文化話語中。

傷痕書寫有一明顯的特徵，即不斷地返回那創傷的時刻與現場，讓書寫的「此在」與創傷的「存在」構成了隱喻系統。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認為：創傷(trauma)之後有一強迫重復原則：回復事物早先狀態，重返暴力現場。²因而留在臺灣的洪棄生，〈割地議和記事〉吟道：「眼見島夷竟得天，心痛中華長失歲。沉淪身世付滄荒，分裂乾坤銷猛銳。」³他在空間地點並未移轉改變，只能心痛屬於中華紀年時間之斷裂，控訴日本霸權之得天。而內渡的丘逢甲，〈往事〉一詩寫道：「往事何堪說，征衫血淚斑。……不知成異域，夜夜夢臺灣。」⁴在空間上雖轉換了外在的環境，卻改變不了內在的心境空間，仍不時翹望海東、夢回臺灣；而時間上，也一直膠著於創傷巨變的時刻：「春愁難遣強看山，往事驚心淚欲潸。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臺灣。」(丘逢甲〈春愁〉)⁵可以說，洪棄生在原地不斷地檢視臺灣地理／肉身上的傷痕，丘逢甲則隔海療養著心傷。這都凸現中國挫敗、臺灣割傷的歷史現實，鋪陳而為一受傷害的「隱喻」表意系統。

但是在此時，梁子嘉《日東遊草》則似是日治初期普遍抗日傷痕表意系統之外的異數。考梁子嘉雖為一外來文人，但清領時期久居臺灣，可說亦屬認同臺灣之士。且據史載：乙未(1895)割臺時，梁子嘉委署彰化縣令，率其佃兵與吳湯興徐驤輩轉戰新竹、苗栗間，

¹ Sigmund Freud, *The Standard Edition*, Vol.XVI (The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London, 1963), Fixation to Traumas—The Unconscious, p275.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under the General Editorship of James Strachey,

² Sigmund Freud, *The Standard Edition*, Vol.XVIII,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p13.

³ 清·洪棄生：〈割地議和記事〉，《寄鶴齋選集》(臺北：臺灣銀行，1972年)，詩選·詩(中)七言古體，頁270-271。

⁴ 清·丘逢甲：〈往事〉，《嶺雲海日樓詩鈔》(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0年)，卷二·丙申稿(光緒二十二年)，頁28。

⁵ 清·丘逢甲：〈春愁〉，同前註，頁26。

事敗攜其番妾從劉永福倉皇內渡，盡喪其資財，詩文亦散落。⁶則其率兵轉戰之激奮、事敗倉皇之驚嚇，此一命懸旦夕的深刻記憶如何可忘？因此在乙未之變之後，我們很難說其未帶有這國族之變的傷痕。但丙申年三月，他即由廈門遠渡日本，由長崎入內海，經神戶，由橫濱上岸。詩中似並未重述乙未創傷，也無反復淪陷記憶，因而引人質疑：《日東遊草》是否也屬於臺灣乙未之變的傷痕論述、療傷系統？或只是其個人主體認同游移流動的離散論述？

在進入全詩之詮釋考察前，有必要先瞭解他的生平，以釐清這樣的敘述主體與一般臺灣文士之異同。

二、客中處處是蓬萊：流動的敘述者

梁成枏（1850～1899），⁷字子嘉，號鈍庵，清廣東三水諸生。少懷才負氣，應制科時因得罪有司，離鄉出走；遍遊長江中下游，曾於吳、楚一帶擔任幕客。厭刑名、錢穀之俗，後東渡來臺。居臺十餘年（約 1885～1895），入巡撫劉銘傳幕下，並在中部統領林朝棟軍隊擔任書記，掌理開山撫番之相關文書，深得劉銘傳器重。據《臺灣通史》說：「當是時，巡撫劉銘傳方倚棟軍以治番，私牘公務日或數至，主文者每辭不達意，至是壁壘一新。銘傳奇之，詢主將以文出誰手。告之，且薦其才。光緒十二年，東勢角置撫墾分局，檄主之。」光緒十二年（1886）負責東勢角撫墾事宜，親自走訪各番社，詢問民眾疾苦，並納番女為妾，甚得當地住民愛戴。光緒十三年（1887）安撫萬社番民，並有意開發卓蘭一帶，置產臺灣。乙未（1895）割臺，梁子嘉委署彰化縣令，率其佃兵與吳湯興徐驤輩轉戰新竹、苗栗間，事敗攜其番妾從劉永福倉皇內渡，盡喪其資財，詩文亦散落。日治後，再度來臺，寓居霧峰林家，主林家塾，為林幼春老師。曾走訪鹿港洪繻，以詩唱和，相談甚歡。後因在臺不得志，鬱鬱離去，客死於香江。⁸

⁶ 林資修（幼春）：〈梁鈍庵先生傳〉，《臺灣詩薈雜文鈔》（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6 年），頁 20。

⁷ 《臺灣日日新報》03 版（1898 年 12 月 23 日刊）：「粵東廣府梁子嘉刺使，舊政府時遊幕臺陽。……去冬買棹回粵，近復作香江之遊，藉謀館穀。不料……一病不起……」。又感謝本文匿名審查人提供：館森鴻〈懷舊錄（八）〉所載，梁子嘉於明治三十二年（1899）秋，客死香港。得年四十有九。則推算得知其生卒年。

⁸ 同註 6，頁 20。連雅堂：《臺灣通史》（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2 年），卷三十四列傳·六流寓列傳，頁 903，大底承襲林幼春此傳。另參全臺詩編輯小組：《全臺詩》（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8 年），梁成枏，編校者施懿琳所撰：〈提要〉，第 12 冊，頁 667。

梁子嘉詩之造詣極高，惜其存詩不多。⁹而於詩史留名，也似只見於臺灣。向來論日治臺灣古典詩者皆盛稱林幼春，而梁為其師，則其詩藝可知矣。洪繻《寄鶴齋詩話》評云：「鈍菴詩法，蓋由昌黎入手而上溯杜公，旁及蘇、黃也；故健而峭，宗派甚正。」《臺灣日日新報》曾論其學曰：「鈍庵於詩經左傳，至為爛熟……他如史記漢書文選、杜詩韓詩蘇黃詩集，有謙言六分熟、四分熟者，亦大體於集中之長篇巨作，一一暗記，不遺隻字。」¹⁰近人李漁叔認為梁成枏詩，即境抒思，吐詞真切，能摒除浮詞偽語，自有清爽情致。¹¹而其一生飄泊羈旅，是以詩亦零落不存。然僅得區區餘稿，卻已足以見證其人品風格。

梁子嘉自謂：「自思作客二十餘年，不論久暫，皆島國也。定海¹²八年，臺灣十一年，廈門半年；今遊日本，難不作久居計。履齒所及，亦是前緣。」¹³可見他一生一直是一流動的主體，時含移轉的視角、開闊的胸襟；臺灣是其最久的居所，而最遠的一次行腳則是乙未之後的日東之旅。至於他何以在乙未之後旅行日本，詩中未言，史傳未載，今之學者也未明所以。因而其旅日動機，在臺、中、日文化論述中乃宛然形成一隱藏的「文化無意識」，亟待理解與詮釋。本文在展開詩文的詮釋時，也嘗試解答此一「文化無意識」之空白。

考《日東遊草》初作於 1896 年梁子嘉旅日時，後寄與當時內渡避亂在上海的林朝崧，並於《臺灣新報》1897 年 2 月 21 日及 23 日-25 日四日連載；¹⁴各首雖為抒情詩，但其依

⁹ 連雅堂嘗輯其遺作六十餘首為《鈍庵詩草》一卷，刊於《臺灣詩薈》第九、十、十一號，（1924 年 10 月—12 月）。其詩多作於東勢角撫墾之時，據連雅堂：〈鈍庵詩草序〉云：梁子嘉「曾賦臺灣諸將四十首以示〔林〕南強，南強藏之久而遺失。」又云：「及余寓稻江，獲葉友石。友石謂鈍庵北游時，攜有詩稿三卷，方欲錄副，忽接電報，倉皇歸去，遂客死香港，詩稿盡沒。因誦其破畫殘稿二首，則亂後再來之作也。嗟乎！鈍庵以嶺嶠之英豪，為東寧之羈旅，懷文抱義，眾多景行，而詩獨不傳，惜哉！余竭力搜求，計得六十有八首，次為一卷，以付梓人；而鈍庵之詩乃稍存矣。夫鈍庵豈僅以詩存哉？向使不遭非常之變，招徠番黎，墾田樹藝，當必有所建立，何至窮愁以死？然士君子之處世，在百年而不在一日；鈍庵雖逝，固有不朽者在。因刻其詩，以訊吾黨。」連雅堂：《雅堂文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77 年），卷一，頁 47。

¹⁰ 〈無腔笛／中部漢學家〉《臺灣日日新報》4 版（1924 年 10 月 17 日）。又云：「其所讀之書，類經手抄，積成數箱。……至其篤行方法，則磊磊落落，不屑苟合；一言不用，復繼之以再，再復不用，則拂衣去。雖約傲骨嶙峋，時或失於中庸，然亦足以愧殺世之脂韋、而徒事迎合者也。」

¹¹ 李漁叔：《魚千里齋隨筆》（臺北：文海出版社，1981 年），卷上，頁 119-122。

¹² 定海是舟山群島和舟山市第一大城鎮，位於舟山本島中南部海濱，歷代均為中國海上貿易和海防的重地。

¹³ 梁子嘉：〈舟泊神戶〉，《臺灣新報》（臺北：臺灣新報社）01 版（1897 年 2 月 23 日）。「難」字經廖振富校正當為「雖」之誤，見廖振富：〈飄泊與定根：晚清旅臺詩人梁子嘉及其作品初探〉，《臺灣古典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晚清到二二八》（臺北：國立編譯館，2007 年），頁 13-53。

¹⁴ 因《臺灣新報》24 日所載未署名，後之蒐詩者多易忽略。《全臺詩》以連雅堂：《臺灣詩薈》（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年）收錄為底本，但輯前八首；廖振富：〈飄泊與定根：晚清旅臺詩人梁子嘉及其作品初探〉曾為文首探梁子嘉詩，並對於《臺灣詩薈》所缺者增補篇目，然於《日東遊草》部份但補詩目，內容仍闕而不論。本文乃擬細作校注詮釋，以為梁子嘉《日東遊草》之完整呈現。

時間順序記錄旅程，自然也構成了一系列遊記般的「旅行敘述」作品。「敘述」涉及線性和重複，是對業已完成的事件之重述。¹⁵在敘述同時，這事件也被闡釋。而「敘述」其實也是某種「旅程」；「敘述」與「旅行」，皆具有時間線性路徑，也具有需要闡釋的開放性視角。因此我們在此所謂「旅行敘述」，「旅行」既作為一客體事件有待重述，亦作為一主體行為可以展開一流動開放性的視角，其間也隱含判斷、闡釋。無論是真實，或涉及虛構，在主體與客體合一下，都編成一時間性線索，引導讀者去解讀。所以旅行敘述必有一流動的視角，這與他漂泊的身份正好暗合。在閱讀詮解《日東遊草》的過程中，我們也要探索：日本之遊的敘述，如何帶著流動開放性視角，又如何演述其主體流動的時間性歷程？

以此「旅行／敘述」的形式觀念，我們可將全卷詩分為以下結構：

話語系統 時間歷程	旅行	敘述	《日東遊草》
前段	行前	前奏	〈約人游日本久不來，賦日本一首〉至〈東裝有感〉四首
	啟程	序曲	〈三月十八日雨泊長崎〉至〈十九日喜見長崎山色喜賦長句〉三首
中段（一）	拓展視野： 認同與辨異	發展	〈二十日舟入內洋...〉至〈題陶朱公像〉七首
中段（二）	深入闡釋	轉折高潮	〈日東雜詠〉組詩七首
後段	融合自我他者	衝突解決	〈有泉之女...〉
	賦歸	尾聲	〈將歸〉

至於其詩中內容對於日本的港市風光、歷史文明，多所落墨——無論抒情想像與審美觀照，或詠史感時而微言批判；從中都可考察漢文化圈中的古典詩人對東亞新帝國日本，在文化上的辨異與認同、在情感上的憧憬與迷離。全卷實為一東亞巨變下越界旅遊感思之精彩創作。然則他又如何藉由越境之旅，省思東亞間日本與中國、臺灣的糾葛關係？其異地遊歷，與守在臺灣的棄地遺民、內渡避亂的流亡移民，在地理意象、空間意識與時間意識上有何異同？最終，我們嘗試解答：他的旅行敘述與當時臺灣普遍的傷痕書寫表意系統是否有內在的關係？

¹⁵ Joseph Hillis Miller, *Reading Narrative* (Norman: 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1998), p.47-48.

三、聖人西海還東海：時間與空間的越境

在時間歷程的前段——旅程行前及啟程、敘述前奏及序曲，《日東遊草》不只是敘述行前籌畫的內容，或啟程之初的景觀，也表現了主體（梁子嘉）對時間的艱難抉擇以及對空間的矛盾欲望。時間抉擇的艱難在於：對未來想像時其實壓抑著對過往的感傷；空間的矛盾欲望則在於：應該固守舊地或越境他方？以下依其詩順序分兩小節析論：

（一）未到吾能夢見之：感傷與夢想的矛盾

如果不計甫受的國仇家恨創傷，未去之前，梁子嘉想像的日本其實是一神山仙境，從古籍記載，那是秦朝徐福入海求仙所到的地方。《史記》的〈秦始皇本紀〉：「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¹⁶客體遙遠的距離、模糊的視野，更增主體想像之動力。因此詩云：

未到吾能夢見之，神山縹渺海迷離。求童男女開仙國，得好江山助我詩。蕭颯鬢毛為客久，屯遭骨相上官遲。宣尼有說應三復，君子何心陋九夷！（梁子嘉〈約人游日本久不來，賦日本一首〉，1897.2.21.1）¹⁷

此詩前半點出主體自我與旅地客體的內涵關係，既是詩人未到之前的夢境想像，也是日本一國的美好原型——與世無爭的世外仙鄉。（但這一美好原型做為今日翻騰東亞的軍國主義日本帝國之前身，乃成了強烈的對比，也構成無比的反諷。）旅行的國境既是座落在秦漢帝國中華政統以外的仙境，此行乃是由現實到虛構的越界之旅。第四句固然是由（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物色》：「江山之助」典故而來，但未始沒有現今的意涵——雖然甲午戰爭日本以軍事武力佔領中華國土，然而此時詩人卻打算以審美眼光、文學詩筆來佔

¹⁶ 日本方面也有徐福的記載與傳說。據日本《國史略》也提到：「孝靈天皇七十二年，秦人徐福來。（或云，徐福率童男女三千人，齋三墳五典來聘。福求藥不得，遂留而不歸。或云，止富士山。或云，熊野山，有徐福祠。）」岩垣松苗編：《校正國史略》（京都：五車樓，1874年），卷1，頁8。

¹⁷ 引詩之後所標之數字為《臺灣新報》刊登年—月—日—版次。下同。本詩又見連橫主編：《臺灣詩鈔》，（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97年，臺灣文獻叢刊），卷九，頁180。

「得」日本江山；在乙未之變，日本政府宣示領臺主權的年代，梁子嘉的旅行因而也充滿對日本國土觀照的反向倒影。詩後半則道出主體自我與旅地客體現實接觸的外延緣由。常在客中、久做幕僚的士人，多未能真正掌有用世主權；「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越境到九夷，乃成了傳統士子另外選擇的經世之路。透過儒家聖人的話語，九夷境外與華夏場域乃得以相接連繫。

同遊者久不來，使旅途的起點呈現逆勢跌宕。一面安排妻妾回粵，一面待同遊者。詩人補捉這兩端，歌詠旅程之耽延，不只是記錄瑣事，其實更在蓄勢，讓旅程造成懸念，敘事有了波瀾的趣味：

蠻腰素口笑辭之，勿向人前哭別離；童女三千吾有妾，達夫五十老娛詩。歸猶緩緩卿何戀，來怪姍姍爾猶遲！襜褕恐因私顧婢，乘桴或自畏居夷。（〈因欲游日本，遣妾回粵，待同游者仍不來，次前韻〉，1897.2.23.1）¹⁸

此詩後半，以妻妾與同遊者兩兩互文對句，表示兩種意向的拉扯：前者代表自己歸鄉回粵的意向，同遊者代表一探日本新世界的意向；在此兩方意向拉扯中，其實也象徵臺灣居民在巨變之後的矛盾：究竟內渡尋求祖國的庇護，或徑迎向新宗主國日本？也指出敘述活動對時間的矛盾欲望：究竟返回過去還是面向未來？矛盾也在下兩首中：

嘗膽君臣計若何？匆匆又是一年過。暮春三月今逾朔，去歲茲辰正議和。¹⁹莫倚神靈趨鐵馬，會看荊棘歿銅駝。腐儒一飽雖無策，僂目傷心自縱歌。（梁子嘉〈丙申三月初九夜有感〉，1897.2.21.1）

首聯指臺灣武裝抗日，「臺灣民主國」敗亡後，²⁰君臣眾人臥薪嘗膽準備再起，但匆匆無情光陰已過。據《臺灣通史》記梁子嘉「與吳湯興等於新竹、苗栗附近抗日，事敗攜其番妾倉皇內渡……」雖有學者認為此猶待考證，²¹但由此詩首句關懷「君臣」之語、五句寫乙未之役，當可肯定其曾參與。頸聯以「神靈鐵馬，荊棘銅駝」的形象，說出臺灣極力抗

¹⁸ 本詩又見連橫主編：《臺灣詩鈔》（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97年），頁180-181。

¹⁹ 李鴻章於1895年3月14日晨，乘坐德國商船由天津啓碇，19日晨駛抵下關。1895年3月24日結束了第三次會議，李鴻章遇刺養傷兩週後，四月十日再度親赴會談，至4月17日，雙方於春帆樓簽訂了《馬關條約》。

²⁰ 「臺灣民主國」之成立，原臺灣巡撫唐景崧擔任大總統。但不久唐景崧內渡中國大陸。6月下旬，民主國在臺南擁立原大將軍劉永福為第二任大總統。10月19日，劉永福亦兵敗內渡；兩日後臺南陷落，臺灣民主國因而滅亡。

²¹ 見廖振富前揭文。

爭的意志，終究抵不過國族遞變、朝代更迭的命運。據洪繻〈追述去冬時事〉詩云：「時十一月歲乙未，臺山北海如波沸。遺民義氣薄雲霄，欲轉漢天迴漢地；驟似雄風吹雨來，復似怒潮挾沙至：重重夜突臺北城，驚殺倭兵失夢寐。城頭半夜起狼煙，城外連天列象燧；倭酋持鎗盡欲狂，倭卒尋刀起如醉。……」²²則可知梁詩所謂「倚神靈趨鐵馬」之激烈狀況。而當時多位將領都有再戰之意。如吳湯興²³就曾作詩：「聞道神龍片甲殘，海天北望淚潸潸；書生殺敵渾無事，再與倭兒戰一番。」（〈聞道（七首錄一）〉）丘逢甲亦有：「捲土重來未可知，江山亦要偉人持。成名豎子知多少，海上誰來建義旗。」（〈離臺詩〉其二）隔年的詩〈送頌臣之臺灣〉亦云：「……全輸非定局，已溺有燃灰。棄地原非策，呼天儻見哀。十年如未死，捲土定重來。」因此在 1896 年，梁子嘉此語「莫倚」兩字雖看似自喪其志，但在尾聯的烘托下，卻是世局紛亂塵埃落定之後的沉痛喑啞之聲。人以為鐵馬干戈、金石重器足以永保千年萬世，卻終不敵荊棘蔓草之植物，榮枯隨意。種種臨界的思考，讓他籌畫越境旅行一趟：

塊磊仍非酒可澆，咤聞喝落廈門潮。聖人西海還東海，大局南朝與北朝；衣服一均從趙改，詩書何罪繼秦燒！毛錐我亦嫌無用，入市先求八尺刀。（梁子嘉〈束裝有感〉，1897.2.21.1）

時梁子嘉在廈門，若其乙未 10 月從劉永福內渡，則至丙申年三月正好半年。在歸鄉與東遊的矛盾下，塊磊滿懷，陷於膠著，但忽然頓悟，乃心意一決。「喝落廈門潮」表示在心理空間上降低廈門的位置，將擺脫牽絆，離開此地。頌聯語出陸九淵：「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²⁴聖人隨處皆可，大局也不該陷於固有的中心。大破大立的時代，必有大開大闢之局勢。至此梁子嘉乃突破國度界限，拓寬時空視野，為自己的日本之行理出意義。頌聯引戰國時代趙武靈王實行「胡服騎射」改革的史績典故，²⁵說明服色改革似已勢在必行，隱喻臺灣接受日治的事實。衣服、詩書、筆墨，俱往昔日常所需，而今局勢突變，行程將啟，乃將這些全然拋棄，切斷熟悉的生活意義世界，孑然一身，飄然遠行，寫來既是沉痛，又是瀟灑。所有旅程在臨行之前，固然必否定舊有的經驗模式，以開啟一未知領域；但梁子嘉去國之際，對服色、經典、文

²² 連雅堂：《臺灣詩鈔》（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97 年），卷十二，頁 211。

²³ 「吳湯興，字紹文；清苗栗銅鑼灣人，廩生。光緒乙未抗日之役，以統領名義籌餉募勇，奮力抵禦。後退至彰化，戰歿。」同前註，卷十，頁 183。

²⁴ 清·黃宗義、全祖望：《宋元學案》（臺北：世界，1991 年），卷五十八《象山學案》（黃氏原本、全氏修定）〈艾軒講友〉〈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頁 4。

²⁵ 這段史實見諸於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史記》（臺北：藝文印書館，2005 年），卷 43〈趙世家〉，頁 1806。

物的檢視，更是對故國政治典章制度的質疑。此行乃因而不是個人私我的愉悅旅行，而是帶有國族大我沉重視域的時空越境。

（二）山川勢欲仙：進入他方的想像

當梁子嘉直抵日本長崎，對異地的凝視與想像就活躍起來：

頗耐長崎雨，全昏海外天。萬家臨水屋，一闌上煤船。男婦衣殊製，山川勢欲仙。
聊寫知道里，關吏筆抽鉛。
三老來相告，船行入內河。浪方香港細，山較廈門多。鷹餓捎平水，鷗輕逐去波。
明朝神戶雨，無計奈愁何。（梁子嘉〈三月十八日雨泊長崎〉，1897.2.21.1）

初臨日本，首見長崎大雨渾茫一片，呼應之前惆恍迷離的夢境想像。近景水岸人家、船舶人潮，才認清日本人民服飾與中華的差異，更映證三千童男女渡海開國的異地想像。次首在內海航行時凝視週遭，中間兩聯分別以題釋句提出「題語」：浪、山、鷹、鷗，領聯呈現靜觀場景，對此陌生之地與熟悉舊地比較；而頸聯則因水鳥動作，吸引視覺焦點。漂浮水面的飛鳥，多少也是漂泊身世的自我隱喻。下一首云：

萬斛舟難一日停，停舟又恨雨冥冥。山如新婦常遮面，地想神仙不露形。觀我奔騰
頭半白，冀君盼睐眼終青。貴人謝客尋常有，世外煙嵐幾見經。（梁子嘉〈長崎雨
泊馳笑山靈〉，1897.2.21.1）

對異地的印象凝視之後，接著又以譬喻形容：「山如新婦常遮面，地想神仙不露形」，以疊加風景的意涵。然後在此隱喻的基礎上繼之以聯想主客彼此的互動，陳明自己頭已半白，為尋仙不遠千里而來，企盼博得山靈青睞。如此將山水景色擬人化的想像，已較初觀印象更進一層。後兩聯句法皆對等又流動，形成流水對，推動意義的表演進程。擬人的想像在以下一詩中更為推展：

新婦隔朝便梳飭，曉來鏡裏青螺色。昨夜催妝吾有詩，老興清狂饒筆力。海日初燠
十丈紅，江波遠浸千尋碧。山川明媚入朝暉，作意來娛萬里客。客行萬里無交親，
以爾青山作主人。海外逢迎無俗態，客中攬結得情真。交情白日與皓月，山容青青
我華髮。但恨舟壑無久淹，轉眼即為胡與粵。爾來先我二千歲，應見秦人來避世。

安期遊說本恢奇，徐福神僊多詭計。後來方士何荒唐，謬說迎仙需候氣²⁶。倏云有地卻可欲²⁷，又患旋風難得至。山耶渺在白雲鄉，誤死秦皇與漢皇。今我一揮東海袖，茲山盡入小奚囊。囊詩盛付中原去，化作霏霏五色霧。故人迢遞隔塵中，不見倚舟臨海題詩處。（梁子嘉〈十九日喜見長崎山色喜賦長句〉，1897.2.23.1）

本詩續上首而來，隱喻喻依（新婦）直接出場，而喻體（山）隱身背後；喻依由作者所創造，因創作之筆力而有所變化，彷彿主體的作用力量竟更能改變客體（山色）本身。其次寫山容水貌之變化，如人之妝扮以迎萬里來作客的詩人。續寫主客之間的關係，自己到訪此地，無所親識，只有山水日月相迎。「交情白日與皓月，山容青青我華髮。但恨舟壑無久淹，轉眼即為胡與粵」四句之間，產生主客之間、時空距離的相互轉換，尤其後二句表面上寫舟行之速，實則乃喻此地的時間空間並非世俗的一般時空，而具有魔幻的神力般迷離惝恍。繼而從時間上看，「爾來先我二千歲」允為神來之筆，青山在此本是無所謂先來後到，但詩人將那不可經驗的「先在」轉成年歲時間上的先來，擬人之筆法可謂更進了一層，也讓青山閱歷了避秦亂者、安期生、徐福等等的來到。而後來的方士謾說迎仙需等候時氣，又說旋風干擾，難以到達此地，這在史記中均載，如：

方士徐市等入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鯨魚所苦，故不得至……（《史記》〈秦始皇本紀〉）

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耶？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秦皇帝大悅。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史記》〈淮南衡山列傳〉）²⁸

結果仙鄉只是「烏何有之地」，秦皇漢皇都因尋仙未成而死。詩中下此「誤」字，詩人多少有些得意：古代皇帝費力而不可得者，今天輕易地來到，證明仙鄉是確有其地。而後又將仙鄉景色以「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陸機〈文賦〉）的方式，遙寄故人去，這一連串的動作，使得本為詮釋物象景色（意旨）的「詩」（意符），反過來成為物象景

²⁶ 占驗節氣的變化。古人將葦膜燒成灰，放在律管內，到某一節氣，相應律管內的灰就會自行飛出，據此，可預測節氣的變化。漢·班固：《後漢書·律曆誌上》（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頁3024：「候氣之法，為室三重，塗罫必週，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動。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

²⁷ 「欲」字《全臺詩》（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8年）作「望」。

²⁸ 同註25，卷6〈秦始皇本紀〉，頁263、卷118〈淮南衡山列傳〉，頁1258。

色「迢遞隔塵、倚舟臨海」所烘托的意旨。全詩皆如此以神話思維敷演成篇，讓詩人創作主體與地理景色客體融合為一，具有一種「人仙合一」的神聖臨在感。

本詩實可與蘇軾〈登州海市〉²⁹比美。兩詩都論到：本來從凡俗肉眼，並未能見某種自然奇觀，但在主體自我與地理神靈之間，卻有某種通關密語，因而仙境驚鴻一瞥的現身，讓詩人有「率然有請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窮」的感動。一如拉岡（Jacques Lacan）所說：實在界便是那「我思、主體」遇不到的地方。³⁰若日本仙境對於梁子嘉是如此豐厚的相報，旅行顯然已越過疆界，到達了彼岸。

四、殷勤物色風塵際：比興空間的移動

旅行書寫的意義在於：該地的地域形象、場所精神，讓詩人的吟詠產生不同的物色情采、場景氛圍，也鉤沉出各別的歷史積澱，結構出不同的比興空間。如果比較洪棄生所寫〈島上〉一詩：

島上事蕭蕭，重關阻客輶。雲封閩海雨，水落浙江潮。淡菜高麗脆，櫻花日本嬌。
誰營南北路，十載始通橋。³¹

首聯寫本島蕭條，對外閉關，頷聯寫通往中國的海路斷絕，頸聯言島上的風物變換，末聯點出此一座標本屬東西向的動力軸，今已改換成南北向了。他留意到乙未之變後臺灣的改變，但詩境中的比興空間，實是透過一固定的座標軸而觀照。再看丘逢甲〈對月書感〉：

明月出滄海，我家滄海東。獨憐今夜見，猶與故鄉同。喪亂山河改，流亡邑里空。
相思祇垂淚，顧影愧歸鴻。³²

²⁹ 詩云：「東方雲海空復空，群仙出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宮。心知所見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歲寒水冷天地閉，為我起蜃鞭魚龍。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人間所得容力取，世外無物誰為雄。率然有請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窮。……新詩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見宋 蘇軾著，清·王文誥、馮應榴輯注：《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中）卷26，頁1387-1389。

³⁰ Jacques Lacan,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XI,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4), p59.

³¹ 洪棄生：〈島上〉，《瀛海偕亡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59年），寄鶴齋詩選·五言今體，頁83。

³² 同註4，卷四·戊戌稿（光緒二十四年）〈對月書感〉（二首），頁64。

此詩則在異鄉遙想故鄉，比興之能指（明月、滄海）與情思之所指（臺灣）實際隔著遙遠距離，未如歸鴻尚可往返，所以只能相思垂淚了。丘詩的比興空間，則是透過與「故鄉山河」對等且延續的座標軸而觀照。然若觀察梁子嘉旅程中段之比興空間——流動傳移的座標軸，則又是一番不同的動力場域。

當梁子嘉在日本內海，以為神仙之境竟如此輕易到達，不禁得意地再詠一律：

好山何必以名求，想像人言是十洲³³。蹴鞠客難尋走馬（風日甚佳，西人在船上戲蹴鞠）³⁴，飛輪舟易到牽牛。十年蠻府誰知我，萬里仙槎此壯遊。今日登臨神戶曉，當時生死鬼門秋。（梁子嘉〈二十日舟入內洋，四壁青山，風日晴美，波浪安穩，舟行所希有也。身倚舵樓，手弄白日，賦詩一首〉，1897.2.23.1）

領聯對句甚工。「蹴鞠」是源於中國而傳至日本的遊戲，而今更有西人參與，船板上已然展演一場多元文化匯聚競爭的象徵活動；而西人入境，更增添十洲之為異境之想像。「飛輪」指船行日本內海，如入星河仙境；而此路正是古人為避亂隱世而來。而若上句「難尋走馬」象徵的是「競爭」空間的狹隘侷促，下句「易到牽牛」則象徵「離讓」所開出的疏朗開闊空間。詩人回想過往在臺十年辛苦治理番民，而今何幸得以乘此仙槎暢快壯遊，似有苦樂對比之意。地名「神戶」隱喻「神仙之門戶」，末句「當時生死鬼門秋」語甚晦澀，或者意指去年日軍壓境之事；從「今日登臨神戶曉」到「當時生死鬼門秋」，即梁子嘉對「日本」印象是友是敵之矛盾；今昔之對照、神鬼之互舉，似乎對日本一國的意象，恆在「仙境」與「鬼域」之間不斷迴旋著「迎」與「拒」的矛盾與衝突。

梁子嘉一生飄泊，所到之處都是蓬萊島嶼；然如上一詩所顯示，詩人主體與地理山川之間總有許多靈氣感應之引力。因而下一首是：

³³ 西漢東方朔撰寫的《十洲記》。《十洲記》一卷，又名《海內十洲記》、《十洲三島記》，全文以東方朔的口吻，描述「八方巨海之中」的「人跡所稀絕處」，有十個神仙居住、長滿「神芝仙草」等仙藥的島嶼，是渴望成為神仙者夢寐以求的地方。這十個仙島依次為：祖洲（位於「東海」）、瀛洲（位於「東海」）、玄洲（位於「北海」）、炎洲（位於「南海」）、長洲（位於「南海」）、元洲（位於「北海」）、流洲（位於「西海」）、生洲（位於「東海」）、鳳麟洲（位於「西海」）、聚窟洲（位於「西海」）。但《四庫全書提要》中的考證指出，西漢晚期學者劉向在著錄東方朔的著作時，並未有包括《十洲記》，其最早著錄則在唐代修纂的《隋書》〈經籍志〉：「十洲記一卷東方朔撰。」唐·魏徵等：《隋書·經籍志》（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頁983，宜是託名東方朔撰寫的作品。

³⁴ 中國古代稱踢足球為「蹴鞠」，亦稱「蹋鞠」。劉向《別錄》：「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蹋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漢·班固，李賢注引：《後漢書·梁冀傳》（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頁1178。「蹴鞠」也見於朝鮮、日本和越南等東亞國家。現今日本的傳統活動中仍保有蹴鞠（日本語：蹴鞠／けまり・しゅうきく）的活動。

客縱〔疑作蹤〕處處是蓬萊，故是仙材亦鬼才。神戶晚春天欲日，廈門古石浪濺雷。
臺遊麋鹿吳遺渚（定海），海入鯨魚鄭死灰（臺灣）。鴻爪雪泥聊作記，愈多行跡
愈堪哀。（梁子嘉〈舟泊神戶。自思作客二十餘年，不論久暫，皆島國也。定海八
年，臺灣十一年，廈門半年；今遊日本，難〔宜作「雖」〕不作久居計。履齒所及，
亦是前緣。作詩云爾。〉1897.2.23.1）

神戶晚春、廈門古石，自有中日海港城市的地域形象。定海之吳國遺蹟，臺灣之明鄭死灰，
刻鏤著爭戰的一時勝負與歷史的永恆沉默。「臺遊麋鹿吳遺渚（定海），海入鯨魚鄭死灰
（臺灣）」以倒裝句法強調居時較久的兩地之深刻記憶；在臺灣，他所記憶的是反清復明
之敗舉，其實或也隱喻了去年剛收場的抗日悲劇。「海」作為他行履的背景，處處皆有絕
佳之風景，但也處處有可哀之命運。此詩雖自傷行跡之漂泊，但也將東亞三地，編入詩語
想像脈絡之中，而開啟東亞海域互相關聯的互文視域。

繼而由神戶到橫濱，遇風浪大作，詩云：

驚飆攪狂波，與船相齟齬。巨艦山嶽勢，起作胡旋舞。浪花高於船，舵樓飛白雨。
船客五百人，或號或不語。號者臥嘔洩，嚙者色灰土。慘愴日本客，僵臥波斯賈。
相持一晝夜，始得一仰俯。君知行路難，古人方猛虎。得意作謳吟，應受風浪苦。
橫濱幸見山，且得韃靼土。（梁子嘉〈由神戶到橫濱，風浪大作〉，1897.2.23.1）

本詩押上聲「虞」韻（「齬、語」二字則押「語」韻），自有艱難困苦之聲情；而意象之
奇險，動勢之驚心，一掃之前風平浪靜之美。風波之阻隔，益見仙境之難尋、越界之艱辛，
也透顯出梁子嘉前往新地異鄉忐忑不安之心境——赴日仙境之旅，不免要穿越鬼域般的險
難。而詩中將風波寫得迴旋起舞，與人主體不斷地相持俯仰，邊境之渡越又成了一可歌可
頌之展演事件。

梁子嘉在長崎興致高昂的神話思維，到了橫濱，仍以高華風貌維繫著；雖然歷經風波
險阻，已不再作神話思維的誇飾想像，但仍以歌詠此世「中心」的比興物色敷演開來：

已入橫濱市上行，重煩關吏語平生。邦人徐福遺男女，家法梁鴻隱姓名。天靄晚春
明海國，地雄三輔翊和京。殷勤³⁵物色風塵際，儻有遺民說舊明。（梁子嘉〈橫濱〉，
1897.2.24.1）

³⁵ 「勤」字《臺灣新報》（臺北：臺灣新報社）原作「勒」，應是形近而誤。

當時橫濱海關檢查甚嚴。連雅堂曾有詩云：「東西潮水此歸虛，津吏狺狺禁挾書。笑問秦時舊童孿，祖龍政策更何如（橫濱關吏搜檢書籍甚嚴，西客尤甚）！」（連雅堂〈東游雜詩〉），即此可見。一入橫濱後，見日本人民，則認為是徐福時的童男女所遺留後世者；觀日本禮儀男女相敬如賓，則以梁鴻夫妻舉案齊眉、隱姓埋名典故形容，亦呼應仙境隱者之氛圍。頸聯以開闊自然之景觀與宏偉人文之建構相對，「地雄三輔翊和京」當指橫濱地近日本首都東京。³⁶詩人將指稱漢文化中心長安一帶的「三輔」³⁷移置指涉日本國度的中心「和京」，這種空間的移位，再加上末聯在此異域「舊明遺民」之懷想，此詩流露出對漢文化原鄉的追尋。滿清已非那夢中古國的理想原型，或許在東瀛，反而可找到代表漢文化的邦人遺民；禮失而求諸「夷」，原來所欲追尋的理想國在此異域。移動了自己的座標，放棄了原以為固定的中心，乃發現了一新中心。此詩重複出現兩次「遺」字，似意味著日本是一過往時間遺留的地方，充滿了可追溯前身的想像。這落後遺衍的時間尺度，仍停於今世之想像之中。如此以「華夷變態」的倒錯鏡象，反思中日間的關係。

梁子嘉「遊」之視角是流動遊移的。此兩首詩意象仍然以仙境之色調鋪設：

桃李陰陰漾綠天，柳枝搖曳嫋濃煙。女郎木屐尋花至，短竹疏籬白杜鵑。
光風一架白薇花，松檜陰中日照斜。剪落柳絲煙滿地，好看人試獨輪車。（梁子嘉〈偶遊〉，1897.2.24.1）

兩首絕句都在視覺意象中由靜景逐漸增加動態；最強的動感意象，更成為視覺的新焦點。「焦點訊息」前首出現在第三句複合動作「尋花至」，末句則陡落成靜止的三個名詞意象；後一首則出現在第四句「看人試車」的複合句法。如此動靜對照的境界，都表現了「遊」時主體與客體之間，主動動態與被動靜態的相互觀照。

街頭一瞥的偶遊，或可比較居於臺灣的洪棄生故鄉劫餘之詩，所見自是不同：

驚天驚地起兵戎，閭左繁華瞬息空；喧路鸛鵲同上蔡，失家雞犬異新豐！蔓煙無復炊煙綠，烽火猶疑燹火紅。舊日樓臺何處認，亂堆殘瓦夕陽中！（〈兵火之後，舊時街衢但存瓦礫；感賦〉）³⁸

³⁶ 19世紀後半期皇室從京都遷至江戶，並改稱江戶為東京，自此東京成為新的日本首都。在明治政府實行現代化政策下，城市也開始出現西化後的面貌；1872年，於東京與橫濱之間日本首條鐵路落成，成為交通上的新創舉。

³⁷ 漢代負責京畿長安附近地方行政事務的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的合稱。

³⁸ 同註22，卷十二·洪繡，頁213。

五胡人馬六朝書，赤壁青山半火餘；一髮中原無望處，年來天似小穹廬！（〈過兵燹地〉）³⁹

其所見是：喧路鸛鵝、失家雞犬、蔓煙烽火……，而空間感上因與中原阻隔，也是侷促狹隘，居於島上如同被囚。然則梁子嘉越境之旅之寬闊悠遊，不言而喻。

而梁子嘉的越境凝視逐漸由愉悅的觀照轉為差異的比較，讚美轉為議論，比興轉為賦體，象徵轉為寓言：

西洋種樹齊如割，小枝大枝不橫越。門前碧草細鋪茵，門外綠枝濃繞闥。東洋種樹勢蓄遏，先求鬱勃後騰達。鋤草真為不毛地，樹下從無烟一抹。老松如石盛瓦盤，羅漢制龍蟠古鉢。瘦竹幽梅受挫抑，江湖已失魚濡沫。暖火氤氳沙石細，冷霜蓋覆玻璃闊。西洋好整用兵法，東洋好詭假菩薩。（梁子嘉〈遊園〉，1897.2.24.1）

此詩寫景完全出之以白描，頗類韓愈之〈山石〉詩。就單首詩而言，固然是遊園時所見，但就全卷詩整體而言，遊覽所見則無非皆其身分認同辯證過程中的「文化寓言」。詩中「好詭」、「江湖已失魚濡沫」（此句固指日本庭園之枯山水，但典出《莊子·大宗師》：「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呿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本具價值批判意味），多少都帶有論斷省思之意。西式花園似兵法尚工整，日式庭園借禪風尚冥想；結尾兩句以形象來論斷，讓此遊園觀覽成為一東洋西洋文化對比之隱喻。

文化差異之比較在以下一首亦見：

富者與仙者，兩者爾何樂？願作陶朱公，不作東方朔。東方先生名神仙，日求二百四十錢。一囊之粟不得飽，大官分肉流饑涎。今觀和製陶朱像，肉食之貌誰為傳？廣額豐頤笑開口，兩耳如聃垂至肩。左肩肩巨囊，其中何止百萬錢。左手撮囊口，實恐錢刀落地化為泉。右手擎一鼓，有柄當中穿；想是左提右挈雄心在，昔操軍柄今利權。其下金繩捆縛三巨囊，兩腳蹴踏兩囊堅，一囊且復以臀坐，如畏探囊肱篋然。不脫軍中金鎖甲，懷如大敵當彼前。知盡能索如獲富，既富情狀何可憐。如斯富者鄙且吝，曷怪愛子中途捐。吁嗟世上守財翁，枉見戲侮日本東。願為餓死東方朔，不願作富者陶朱公。（梁子嘉〈日本寫東方朔陶朱公多子婦為三星圖見陶朱公像甚怪偉因賦〉，1897.2.24.1）

³⁹ 同註 22。

此詩以戲筆寫日本民間財神圖像。陶朱公即范蠡，以經商致富，後世商人皆供奉其塑像，稱之為財神。詩首以問句開端，提問富者與仙者之選擇；先答以「願作陶朱公」，下以白描方式，細寫陶朱公之形貌：廣額豐頤，富貴滿堂，卻懷如大敵，情狀可憐。是以篇終改變前意，「願為餓死東方朔，不願作富者陶朱公」。而這改變是因中國的人物形象東渡之後改變了原貌，移動之後的差異，讓他看到了日本「肉食者鄙」的真相。因此此詩何妨解讀為一文化寓言；洪棄生曾說：「鈍菴警疵袁子才不置，然其〈題陶朱公像〉，筆氣又似《小倉山集》中佳製；予告之，亦不以為嫌。」（《寄鶴齋詩選》）⁴⁰但由詩中一再對「仙者／富者」的抉擇矛盾，不知梁子嘉是否有意以袁枚的近代市民美學詩風，反諷日本近代之走資本主義路線，由「仙者」走向「富者」，「仙境」神韻盡失？

我們看到梁子嘉日本之旅的比興空間，其實是一流動、傳移、變化的座標軸——寬闊的場域、流動的視角，在鬼域與仙境中遊走，「中心之眼」也在故鄉與新地之間潛移；進而我們看到詩中物色的差異、能指的對比，讓情／景、物／我的對等關係，由形變而產生質變，觸目之景（庭園、三星圖等）不能與內心之情融合為一，轉而為寓言批判，對於日本，就不再只是仙境的審美想像了。在未到時出自中國的原型想像，詩中「日本」這符徵的意旨是「仙國」；但來到之後，由想像到親睹、認識，乃逐漸改變了這隱喻的結構，「日本」符徵已暗中潛移了其意旨。梁子嘉似已看到：日本雖富國強兵，但捲入現實的場域、富強的旋渦後，仙鄉之國似已變質，神韻盡失。比興的垂直系統乃逐漸轉換成橫向關係，意符與意符的追逐中，「神聖仙境」成為永遠延遲的意旨，落入神話中對仙境「可望而不可及」的宿命。

五、千年舊國變新章：詠史時間的互涉

越境旅行涉及文化的差異，必也關係國族的互相凝視、認同的齟齬思辯。

乙未之變，對任何經歷過的臺灣人，都是一深刻的傷痕。傷痕書寫是以此時的「我」回溯追憶彼時的「我」，如洪棄生有詩云：

海上人何在，乾坤信渺然。滄桑澎島路，風雨晉江天。未盡庚申世，旋周甲乙年。
寰瀛今已隘，淪落竟華巔。（洪棄生〈海上〉）⁴¹

⁴⁰ 同註3·文選·詩話，頁209。

⁴¹ 洪棄生：〈海上〉，同註31。

洪棄生的時間意識永遠停留於創傷的那一刻，在中華失去的歲時紀年中迴盪不已。丘逢甲則有詩云：

天涯雁斷少書還，夢入虛無縹渺間。兵火餘生心易碎，愁人未老鬢先斑。沒蕃親故淪滄海，歸漢郎官遯故山。已分生離同死別，不堪揮涕說臺灣。（丘逢甲〈天涯〉）⁴²

又如：「飄零剩有鄉心在，夜半騎鯨夢渡臺。」（〈四月十六夜東山與臺客話月〉）⁴³丘逢甲常在虛無縹緲的夢境中，不斷地回歸到天涯海角的臺灣。洪棄生是企圖在時間上作時序逆轉的療程，丘逢甲則企圖在空間上作版圖斡旋的療程。然而無論時間或空間上的返回，往往只是徒然更增痛苦的頻率，即使在書寫中釋放出舊傷，卻又不免再惹新傷。

如果梁子嘉《日東遊草》或也不可迴避這傷痕，但其療傷痕的過程，空間上也是透過距離的隔絕，但卻徑入主動發送傷害的國度（日本）；時間上也擬回溯吟詠，但卻涉入彼國的歷史時間。其〈日東雜詠〉（1897.2.24.1）組詩七首，回溯的時間竟是越過乙未，而直抵古代：

落盡旁權始自王，千年舊國變新章。通隋⁴⁴書已稱天子，欺漢人真作夜郎。危局豕蛇凌北極，遠交兄弟結西洋。入門但有侏儒笑，鞭馬驅車事可傷。（其一）

此詩道盡中日國勢的消長情形。日本自 1868 年，革新派推翻江戶幕府，開始全面西化的現代化改革運動「明治維新」。但清朝渾不知日本國內日新月異的變化，主流觀點還是以「彈丸小國」輕蔑日本。梁子嘉承此主流話語，以中國為天下之中的立足點，看原為中國藩屬的日本，旁權在握、藐視中國；但他也看到日本千年舊國，煥然一新的迥異氣象。其實追溯歷史，古時遼與隋代的國書就已有自立為王此意；⁴⁵近代日本更遠交西洋而侵犯東亞鄰國。尾聯接上自己眼前情景——老大落後的中國，在此新興崛起的日本國境內，大有「虎落平陽被犬欺」之慨。其二云：

⁴² 丘逢甲：〈天涯〉，同註 4，卷一·乙未稿（光緒二十一年），頁 11。

⁴³ 丘逢甲：〈四月十六夜東山與臺客話月〉，同註 4，頁 173。

⁴⁴ 同註 35，「隋」字，《臺灣新報》原作「隋」，應誤。

⁴⁵ 據《隋書》：「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貢。……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同註 33，卷八十一，列傳第四十六·東夷／倭國，頁 1827）。

丸泥三島尚稱雄，況藉遼東與海東。識出滅雞新正朔，詔名元菟舊藩封。何為鐵騎奔如鼠，只恐金臺⁴⁶化作龍。聞道有人收左臂，熊津樂浪已成空。

首聯「尚」字點出：日本國土與國力的反比，何況近年來更增加遼東與朝鮮。頷聯謂朝鮮在甲午戰爭之後，不再奉行中國年號，而自建年號。按古代帝王易姓受命，必改正朔，易服色。「滅雞」當指朝鮮新正朔；⁴⁷「元菟」⁴⁸是漢武帝滅朝鮮時，以沃沮地為元菟郡，故曰「舊藩封」。頸聯謂近代日本軍國主義大張，情勢丕變，原為附庸小國恐將蔚為大國。尾聯謂：更聞向來作為中國左臂的朝鮮⁴⁹都已被征服，「熊津」、「樂浪」⁵⁰皆中國在朝鮮所建立之府郡或屬地，昔時華夏之強盛今皆已成空。以此作結，徒顯無可奈何之餘韻。此詩雖著眼朝鮮，實隱寫臺灣，乙未之後，臺灣也易正朔，切斷與中華的連繫；中國何止收左臂，可謂左右臂皆失矣。

其三云：

泰伯徐生採藥行，共留苗裔在東瀛。真仙避世皆男女，大讓逃蠻有弟兄。今日波揚來秀吉，他年火異產延平。致書沉痛誰哀救，宅相空誇好外甥。

⁴⁶ 古同「蟻」。

⁴⁷ 朝鮮自新羅王真德四年（650）開始奉行唐朝永徽年號後，歷代皆奉行中國年號，一直持續一千二百餘年。甲午戰後，大韓帝國自建年號。朱雲影：〈中國正統論對於日韓越的影響〉，《師大學報》第11期（1966年），頁329。

⁴⁸ 《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燕地〉：「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滅貉、句驪蠻夷。」漢·班固，唐·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6年），頁1658。

⁴⁹ 清代時人指出：「各國之圖中國者，無不圖先佔朝鮮。彼以為朝鮮得，而中國之左臂斷，進可以制東三省而搖我根本，退可以屯兵積聚觀時而動，而中國在其股掌之上。」徐特立、邵循正等編：《中日戰爭》，《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頁585。又明朝向來視遼東為燕京左臂，三面瀕夷，一面阻海，山海關限隔內外，亦形勝之區也。則「左臂」亦可指遼東，但本詩末句所舉俱朝鮮地名，則「左臂」宜指朝鮮。

⁵⁰ 熊津都督府，是唐朝與新羅滅亡百濟後，在百濟故地建立的羈縻府，由百濟遺民管理。「樂浪」見《後漢書》，卷八十五，〈東夷列傳第七十五／東沃沮〉：「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按原注：蓋馬，縣名，屬元菟郡，其山在今平壤城西，平壤即王險城也。）東濱大海，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滅接，其地東西狹南北長，可折方千里。武帝滅朝鮮，以沃沮地為元菟郡，後徙於高句驪西北，更以沃沮為縣，屬樂浪東部都尉。至光武罷都尉官，封其帥為沃沮侯，又有北沃沮，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南接挹婁。」同註26，頁2816。

泰伯是周部落首領古公亶父（即周太王）長子。泰伯、仲雍為讓季歷而奔荊蠻，自號句吳。⁵¹吳國亡國後，仲雍的一些子孫入海，或以為是日人的始祖，⁵²或謂神武天皇⁵³是泰伯、仲雍後人。⁵⁴頌聯本意是：「避世男女皆真仙，逃蠻弟兄有大讓。」但以倒裝句法更突出主題「真仙、大讓」，表示日本國之起源皆因接受了中國之避世仙道與大讓美德。但後來中日之間卻轉換了兩者的授受關係；頌聯謂日本曾由豐臣秀吉發動軍國主義來犯中國，也曾由田川氏在火光中誕生了鄭成功⁵⁵而影響了臺灣。前者一語雙關指近年日本對中國的諸戰役，後者則時更迫近代，引出尾聯，重新省思兩國之間的關係。「致書沉痛誰哀救」指馬關條約簽訂消息傳來，全臺譁然；丘逢甲、唐景崧等率全臺紳民痛哭上陳清廷。然李鴻章主和，不願改約另議，日本也拒絕延緩換約日期，列強都拒伸援手，最後清廷迫於內外情勢，乃於四月初八（五月二日）「君臣相顧揮淚」之下批准和約。⁵⁶「宅相空誇好外甥」語出《晉書·魏舒傳》，⁵⁷此詩則以日本為鄭成功外家，然日本空誇鄭成功為其貴甥，對於中國卻出以軍事行動，且拒緩和約，讓臺灣人民遭受了空前的巨變。結語怨而不怒，語極含蓄。

在對中日關係的沉吟思索，如果上一首詩斥責日本之非，以下則是指責中國之罪：

鄭郎失意窘肥前⁵⁸，和婦聰明解與錢。壯士何堪窮鬼誚，丈夫甘受女兒憐。金繒⁵⁹遣使方歸國，龍虎生男不象賢。頗怪延平祠廟在，不將姓氏寫田川。（自註：臺南太妃神主題翁氏須改寫田川氏為合）（其四）

⁵¹ 據《史記·吳太伯世家》：「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犇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同註 25，頁 572。

⁵² 夏恆翔、孟憲仁：〈從語言化石看吳越人東渡日本〉，董楚平：《吳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293。

⁵³ 神武天皇，是神話中日本第一代天皇，天照大神後裔，其在《日本書紀》中被稱作為神日本磐余彥尊，在《古事記》中則名為神倭伊波禮毘古命。傳說他建立最早的大和王權，為日本開國之祖與天皇之濫觴。

⁵⁴ 雖然此說法並未被歷史學界廣泛接受，但日人如中岩圓月與林羅山皆曾如此認為。江戸時代的大儒林羅山：〈神武天皇論〉云：「吳越共近於我邦，一葦之杭，往來之易，以為太伯之子孫乎？以為少康之後昆乎？是亦未可知也。」林羅山：〈神武天皇論〉，《羅山林先生文集》（京都：京都史蹟會，1918 年），卷二十五·論下，頁 280。

⁵⁵ （日）川口長孺：《臺灣鄭氏紀事》（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年），卷之上，頁 7：「其生也，島中萬火齊明，芝龍心異之。」

⁵⁶ 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 年），頁 92-96。

⁵⁷ 「宅相」謂住宅風水之相。唐·房玄齡等：《晉書·魏舒傳》（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頁 1185：「少孤，為外家寧氏所養。寧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亦用為將出貴甥之典。「宅相」因而亦成外甥的代稱。

⁵⁸ 肥前國，日本古代的令制國之一，屬西海道，又稱肥州。肥前國的領域大約包含現在的佐賀縣及扣除壹岐島和對馬島後的長崎縣。

⁵⁹ 「金繒」指黃金和絲織品，泛指金銀財物，且常用於異域而來之寶物。

此詩詠鄭成功母親田川氏。首聯、頷聯寫鄭芝龍（1604-1661）⁶⁰到日本九州肥前後，因落魄而得田川氏解困，兩人因而成婚。田川氏（1601-1646）日本九州平戶藩川內浦人，生於田川家，後因母親改嫁給華人鐵匠翁翊皇⁶¹，而成為翁氏繼女（所以臺南太妃神主稱「翁氏」）。鄭成功七歲時被接往中國，但田川氏因為江戶幕府禁止日本人出國而無法隨行。十五年後（1645），鄭芝龍透過關係取得幕府特許，始將田川氏接到福建泉州安海團聚。⁶²但次年（1646）鄭芝龍北上降清，清軍攻克福建，陷落安海；田川氏亦遭到清軍凌辱，乃自縊而死。鄭成功憤而率軍出海，繼續反清。⁶³頸聯當寫此事，所謂「龍虎生男不象賢」，嵌用鄭芝龍、芝虎⁶⁴兄弟名，借代指稱中國男子漢，降清引狼入室致使田川氏受辱。⁶⁵是以尾聯痛陳：中國不肖，豈配讓鄭母從漢姓？不如改為日本姓氏才合宜。然而此詩其實也是梁子嘉對臺灣乙未之後的認同省思，如果中國（滿清）未能有為擔當，改從日姓、認同日本，何嘗不是臺灣人的另一種選擇？

思考兩國歷史是非曲直，或將落入永無止境的爭訟。以下一首純由日本神話的觀點，思考日本的國土、皇室、人民之起源，進而看中日關係：

開闢由來事渺茫，況從世外溯洪荒。天矛探海初凝島，神葦成人始號皇。儒釋有書通漢魏，梯船充貢諱隋唐。遙遙華胄何須削，泰伯雲初實不妨。（其五）

首聯言開天闢地之事從來就渺茫難考，更何況是考掘境外的創世洪荒。頷聯乃據《古事記》神話傳說以追溯日本國土形成、皇室人民的來源。「天矛探海初凝島」典故是：由天神所

⁶⁰ 連雅堂：《臺灣通史》：鄭芝龍，中國福建泉州府南安縣石井鄉人，早年往來東南亞各地。「居無何，落魄之日本，娶平戶士人女田川氏，生成功。」連雅堂：《臺灣通史》（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卷二十九，〈列傳一·顏、鄭列傳〉，頁728。

⁶¹ 翁翊皇從中國福建泉州移民到平戶。

⁶² 同註60，頁730：「於是成功在日本已七歲矣，芝龍屢遣人請歸，不能得。乃使使者齎金幣，圖寫芝龍為大將秉鉞軍容烜赫之狀，幕吏受賄歸之。」

⁶³ 同註60，頁731：「方清軍之未至也，芝豹入泉州，大索富民餉，不應，立梟之。抵暮，得數萬金。俄而貝勒博洛及韓固山猝至，乃走，田川氏不去，伏劍死，成功大號，悲不自勝。」「芝龍得書大喜，召成功計事。成功泣諫曰：『父教子忠，不聞以貳。且北朝何信之有？』芝龍曰：『喪亂之天，一彼一此，誰能常之？若幼惡識人事。』鴻遠亦力諫，不聽。……洛知成功雄，俟以俱行，久而不至。芝龍歎曰：『此子不來，清朝其道敞乎！』」。

⁶⁴ 時鄭芝虎已去世，此處當只是借用其名以對，指鄭氏兄弟。

⁶⁵ 齋藤正謙：《海外異傳》：「清兵入福州，芝龍退屯安海，為清將所誘欲降附，諸將不從。成功痛哭而諫，芝龍不聽，單騎往降。清兵至安海，大肆淫掠；成功母亦被污。母歎曰：『何面目復見人耶！』登城樓自殺，投河水。……成功痛恨，剖其母腹，出腸滌穢，重納之以斂。清將挾芝龍而北，作書招成功。成功不至。芝龍曰：『兒不至，北朝其疲於奔命乎！』」見齋藤正謙：《海外異傳》，《鄭氏關係文書》（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附錄，頁78。

賜天矛，攪動海水後提起，自矛尾垂落下來的潮水，乃積凝成海島。⁶⁶「神葦成人始號皇」則因葦草依水而生，日本古為「葦原之中國」，是以葦芽萌發代表神之生成；《古事記》云：「如葦牙因萌騰之物而成神」，⁶⁷據云即是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此後日本與中國更進行同文的儒釋思想交流、⁶⁸且有豐富的梯船進貢，《後漢書·東夷傳》記載：「建武中元二年（公元 57 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光武賜以印綬。」⁶⁹這是最早有關倭國朝貢的記錄。《宋史》又載：「自後漢始朝貢，歷魏、晉、宋隋皆來貢，唐永徽、顯慶、長安、開元、天寶、上元、貞元、元和、開成中，並遣使入朝。」⁷⁰這遙遠地方的華胄，也是泰伯的後裔，本是同根同種，何必自相殘殺？此詩突破國族的意識形態，尊重對方的神聖傳統，更尋得兩邊共同的橋樑，化解了雙方敵對的裂痕。

然而，對於軍國主義始作俑者豐臣秀吉，梁子嘉詩云：

錦旗契箭如鷗張，四國⁷¹諸侯在括囊。羸卒指揮成虎旅，奇威叱咤走龍王。議和軍府籌無策，沈酒藩臣政不綱。尚幸出師身已死，稍存滅貊⁷²舊封疆。（自註：詠平秀吉）（其六）

⁶⁶ （日）倉野憲思校注：《古事記》（東京：岩波書店，1997 年），上卷，頁 52：「於是天神諸命以、詔伊邪那岐命、伊邪那美命、二柱神、修理因成是多陀用弊流之國、賜天沼矛而、言依賜也。故、二柱神立天浮橋而、指下其沼矛以畫者，鹽許許袁袁呂呂邇畫鳴而、引上時、自其矛末垂落鹽之累積、成島，是淤能基呂島。」

⁶⁷ 同前註，頁 50：「天地初發之時、於高天原成神名、天之御中主神。次高御產巢日神。次神產巢日神。此三柱神者，並獨神成坐而、隱身也。次國稚如浮脂而、久羅下那州多陀用弊流之時、如葦牙因萌騰之物而成神名、宇摩志阿斯訶備比古遲神。次天之常立神。此二柱神亦、讀神成坐而、隱身也。上列五柱神者、別天神。」。另《日本書紀》卷第一神代上，第一段：「開闢之初、洲壤浮漂、譬猶游魚之浮水上也。于時、天地之中生一物。狀如葦芽。便化為神。號國常立尊。……」另錄他書皆有類似記載。見王孝廉：《島國春秋——日本書紀》（臺北：時報文化，1988 年），頁 145。

⁶⁸ 如日本於「文武天皇，大寶三年，當長安元年，遣粟田真人入唐求書籍，律師道慈求經。」，「聖武天皇，寶龜二年（公元 717 年），遣僧正玄昉入朝」，「天平勝寶四年，當天寶中，遣使及僧入唐求內外經教及傳戒」等等，見元·脫脫等：《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卷四百九十一，〈列傳第二百五十·外國七·日本國〉，頁 14131-3。

⁶⁹ 同註 26，《東夷列傳第七十五》，頁 2821。

⁷⁰ 同註 68，頁 14130。

⁷¹ 四國島在古代被稱為伊予之二名島（伊予二名洲），後簡稱為伊予島（伊予洲）、二名島（二名洲）。在日本古代的行政區劃中，包含阿波國、讚岐國、伊予國、土佐國等四個令制國（均屬於五畿七道區劃的南海道），近代以降便以「四國」之名稱呼。

⁷² 滅貊（韓語：예맥；Yemaek）是在北到中國吉林省東部、朝鮮西北部的古老民族，朝鮮族先民之一。滅貊，肅慎，東胡被為古東北三大民族。亦作「滅貉」。《漢書·匈奴傳上》：「是時漢東拔滅貉、朝鮮以為郡。」（見同註 48，頁 3773）。《後漢書·文苑列傳上·杜篤》：「東擯烏桓，蹂躪滅貉。」李賢注：「滅貉，東夷號也。」同註 26，頁 2600。

首句寫軍威號令，兇暴囂張；「狼顧鴟張」這些辭彙在漢語語典的使用語境中，多用以形容夷狄，⁷³此詩亦以之詠日本武將豐臣秀吉（とよとみ ひでよし，1537-1598，明朝稱「平秀吉」）。⁷⁴故頷聯上句寫豐臣秀吉本為一羸弱士兵，然最後竟指揮勇猛軍隊完成日本統一霸業。下句寫秀吉曾傲龍王，令其毋作風濤一事。⁷⁵頸聯寫豐臣秀吉攻朝鮮，大有入明之勢；大明國乃起遼東卒往救朝鮮；兩軍戰酣，日軍有人陰與明軍求和。⁷⁶慶長三年，日軍猶設醞釀花會，秀吉往觀之，歌數章。但夏天時，秀吉就病薨。⁷⁷要之頸聯由高峰急落，微諷日本軍國主義剛猛至極，終將脆斷，詠古諷今，實有前車之鑑之寓意。故尾聯「尚幸……稍存舊封疆」，多少寄存今日東亞可能的未來想像。

豐臣秀吉一直是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徵人物。據林南強云：梁子嘉曾做〈臺灣諸將〉四十首，可知其受杜甫〈諸將〉胎息甚深。〈臺灣諸將〉四十首已佚，此詩詠平秀吉，直可視為「日本諸將」，以窺其風格。杜甫〈諸將〉之風，《杜詩鏡詮》引諸家品評云：「五詩訏謨壯彩，與日月爭光。邵云：秋興諸將同是少陵七律聖處，沉實高華，當讓秋興；深渾蒼鬱，定推諸將。」「此與有感五首皆以議論為詩。其感憤時事處慷慨蘊藉，反覆唱歎，而於每篇結末尤致丁寧，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與三百篇並存可也。」「開合動盪，出化入神，不復知為律體，此境係少陵獨步，後惟遺山善學之。」⁷⁸今觀鈍庵詩，正是以議論為詩，深渾蒼鬱，感時微言，慷慨蘊藉，於篇末尤致丁寧勸戒之意。

⁷³ 《隋書·於仲文傳》：「於時河南兇寇，狼顧鴟張，臣以羸兵八千，掃除氛祲。」（見同註33，頁1453）。

⁷⁴ 按其父早歿，依母而活。因家貧而羸弱，本是一下級步兵，後因事奉織田信長而崛起。1585年任關白，1586年受天皇賜姓「豐臣」，並就任太政大臣，掌握了中央政權。1590年，遠征關東，擊敗北條氏，東北諸大名皆歸服，乃統一日本。見廣成子著：《日本史記》〈豐臣秀吉本紀〉<http://zh-classical.wikipedia.org/wiki/%E8%B1%90%E8%87%A3%E7%A7%80%E5%90%89>（2013年6月）。又《明史》（台北：鼎文書局，1980）卷三百二十二，〈列傳第二百十／外國三／日本〉，亦載豐臣秀吉生平。

⁷⁵ 秀吉曾以金一萬枚，糴海道諸國；時海路久絕，民皆憚風濤之險曰：「海龍王為祟。」秀吉笑曰：「吾受王命，討不庭。何物龍王，敢得沮我也？」作檄授之，投海而進。《太閤記》武德大成·〈秀吉傲龍王〉，見（日）石村貞一編：《國史略》（東京：東生書館，1883年，明治新刻第3版），卷四，〈後陽成天皇紀〉，頁27。

⁷⁶ 「時八道幾盡沒，旦暮且渡鴨綠江。秀吉聞前軍陷都城，遣書秀次曰：『韓都已破矣，予將不日入明，奉鑾車而西，以汝為關白。...』乃遣石田三成等三將，...率遊軍六萬赴朝。...大明國聞之，怒其不遜，乃起遼東卒往救朝鮮。明軍初戰，不利；再戰，...日軍食乏。秀吉亦懼，而強令之戰。會大明遣使來議，日軍方得喘息。自是始和談，秀吉模稜其說，而陰令行長、清正聚粟修備。...秀吉...延明使楊方亨、沈惟敬，入伏見城。...命僧承兌讀冊書。...入讀至曰：『冊封為日本國王。』秀吉變色，立脫冕服拋之地，扯裂冊書曰：『吾掌握日本，欲王則王，何待髡虜之封哉！且吾而王，如天朝何？』乃召行長，併明使誅之。」（廣成子著：《日本史記》〈豐臣秀吉本紀〉，同註74）。

⁷⁷ 「夏秀吉病篤，召家康、利家，執其手囑之曰：『今外事如累卵，而吾懼此病。明人聞我死，或大舉來報。國家自古未曾受外辱，及我而辱國，吾所深恥。今以海內托卿等。』...歌迄而薨。家康、利家乃秘其死，傳五大老檄，召日軍悉還。大明、朝鮮追擊之，殺虜日卒無算。秋，卒葬秀吉於京都。」（同前註）。

⁷⁸ 清·楊倫編輯：《杜詩鏡詮》（臺北：華正書局，1979年），卷十三，頁924-930。

前詩詠武將，以下一首則詠文人安倍仲磨（698 年—770 年）：⁷⁹

冠履來從博士遊，東瀛文學邈無儔。才華言偃陳良輩，倡和王維李白流。日與長安相去路，時當開寶太平秋。空揮望月思鄉淚，頭白難迴積水舟。（此詠仲麻呂先生）（其七）

首聯道出仲磨為日本文學泰斗，令人不遠千里而來追從。次聯讚譽仲磨的才華與詩情。天寶十二載，晁衡乘船回國探親。長安朝野人士紛紛送別。王維贈詩〈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⁸⁰他以〈銜命還國作〉⁸¹贈答友人；後傳聞他在海上遇難，李白也曾悲痛寫下《哭晁卿衡》⁸²一詩。此皆盛唐著名詩篇，故有「倡和王維李白流」之句。頷聯暗用「日與長安孰遠」典故，「日」又同時雙關「日本」，可以想見大唐盛世中日關係翕然和諧之況。末聯寫仲磨的名詩；753 年十月 15 日，從蘇州起航回國。是夕浩月當空，仲磨仰視海天，遂吟成思念故鄉的和歌《三笠山之歌》：「天の原 ふりさけみれば 春日なる 三笠の山に いでし月かも」，並譯為漢語示與眾人：「翹首望長天，神馳奈良邊；三笠山頂上，想又皎月圓。」這首和歌後來收錄《小倉百人一首》⁸³中，為該和歌集的第七首，在日本婦孺皆知。末句「頭白難迴積水舟」與王維詩：「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互文，也詠歎仲磨終其一生就留在長安而未能再歸鄉。

梁子嘉此詩回溯仲磨的生平時間，讓自我生命與日本遣唐使的時間交融，借著回溯重修中日的友好關係。梁子嘉與仲麻呂的合一，一在於同是飄泊離鄉，二則心懷漢文化，三同俱文學之才、經世之材，四同為居於邊緣地區，且都越境向他國中心移動，與此一地理空間的中心時相辯證。不同的是：仲麻呂向中國的中心移動，梁則往往反其道而行，向日本中心移動。所同的是，邊緣者對中心常有一驚異的凝視力，仲磨之於長安、梁鈍庵之於日本，乃都留下了不朽的詩篇。

⁷⁹ （日）安倍仲磨（あべのなかまろ，或作「阿倍仲麻呂」）其出生於日本大和國（今奈良縣）。唐玄宗開元五年（717）隨日本遣唐使來中國留學，改姓名為晁衡，字巨卿。歷仕玄宗、肅宗、代宗三朝，任秘書監，兼衛尉卿等職。大歷五年卒於長安。

⁸⁰ 詩云：「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空。向國惟看日，歸帆但信風。鰲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鄉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為通。」清·聖祖敕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頁 1289。

⁸¹ 詩云：「銜命將辭國，非才忝侍臣。天中戀明主，海外憶慈親。伏奏違金闕，駢驂去玉津。蓬萊鄉路遠，若木故園林。西望懷恩日，東歸感義辰。平生一寶劍，留贈結交人。」後收錄於宋《文苑英華》二百九十六，詩部一百四十六，為《文苑英華》唯一域外人士作品。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臺北：大化，1985 年），頁 685。

⁸² 詩云：「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同註 80，頁 1886。

⁸³ （日）鈴木知太郎編：《小倉百人一首》（東京：櫻楓社，1970 年），頁 62-64。

美醜之感可由情景交融的物我對等來達到；但善惡的問題卻必須借由歷史典故方可傳達。因此梁子嘉此行，一方面是藉由山水風光來表達情感的認同、美的欣賞；一方面則藉由歷史典故來表答傷痕的控訴、惡的批判。這一組〈日東雜詠〉詠史詩，讓創傷兩端的生命時間之互涉，乃逐一呈現中、日、臺灣兩國三地之間，既是遠親，又是近交，此間的主動被動關係，恩怨情仇，錯綜複雜，可謂各有千秋；如此將層層傷痕一一根治。在詠史時間的互涉中，傷痕的起源、是非之批判，乃都在詩歌藝術的展現中昇華了。

六、縱不知音意暗通：主體間性的重建

雖然梁子嘉前詩云：「客行萬里無交親」，然而旅行至他方，最渴望的仍然是可以結交異地的人民，認識異己之主體。尤其在衝突創傷後的雙方，一種新的「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al，或譯「交互主體性」）⁸⁴尤待重建；因此除了在歷史時間與既往人物的生命互涉吟詠之外，與眼前現在的人物交往更是此行的最終旨趣。在橫濱，梁子嘉記載了一件異國情誼：

有泉之女，名德入傳，其能琴。有泉為其女求書，予大書「據梧枝策」四字，並以師曠、惠施事釋之。父女均喜治饌，邀余；余手舉卮，請為一鼓。女許諾，抱器上樓。長六七尺，十三絃，素桐黃絲，乃秦箏也。撫弦動操，微吟細調，為羽衣一曲。女笑，示其譜，和草糾結，不能句讀。女以筆譯彼國真書，余仍不解其詞，仍和曲耳。而莊容妙歌，殊非凡響，余喜為一醉，醉後復作狂書，因記以詩。
我操翰墨汝絲桐，縱不知音意暗通。試問橫濱車馬客，幾人青眼到而翁。
老來飄泊嘆無成，春蚓秋蛇遍兩京。自有佳人評月旦，鈍庵能事以書名。
乞得驚鴻一小真，卻隨老鈍走風塵。兩情婚宦難如願，同做人間偃蹇人。
（女年十八九，已失夫矣，亦憾事也。）（1897.2.25.1）

此詩前以長序敘事，將旅程偶遇之事娓娓道來。敘事長序連結了詩內境界與詩外世界，讓旅程中的時間軸線突出，具有情節的趣味與波瀾。其所書「據梧枝策」語本《莊子·齊物

⁸⁴ （德）胡塞爾（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1859-1938）現象學中，「交互主體性」概念被用來標示多個先驗自我或多個世間自我之間所具有的所有交互形式。對本己意識和陌生意識的區分，或者對本己被意識到的世界和陌生地被意識到的世界的區分，皆是一交互主體的問題。參見倪梁康：《胡塞爾現象學概念通釋》（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頁255。

論》：「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⁸⁵梁子嘉或許借此典故以喻才性主體之相感相通，雖技藝不同，猶然可以知音共鳴。梁子嘉之珍惜人與人之間的才性主體，看重人文與藝術，由洪棄生《寄鶴齋詩話》載其兩人相識經過，⁸⁶可見其擺落一切世俗形骸，直道本心之風。

詩而外，梁子嘉之書法亦佳，其有詩論書云：「興酣落筆聲摩空，我與古人何必同，天馬飛馳脫羈勒，豈外初時行步工。」「我不知詩僅識字，筆勢詞源法不二」（〈答王友竹兼呈香谷主政毓臣上舍〉）⁸⁷亦有論書詩〈題行篋內所藏米海嶽各帖戲仿漁洋論詩絕句〉組詩 13 首；⁸⁸洪棄生也曾說：「先生草法，又似宋、元間人。……先生之書可張之座右，與古圖章爭耀者也。」（《寄鶴齋詩話》〈乞梁鈍庵先生書「猛虎行」柬〉）⁸⁹可見其才華乃詩書相通。在日本梁子嘉表演書藝之後，女則抱出秦箏撫絃細歌，雙方雖然語言文字不同，然透過藝術與審美，卻消弭這文化與語言的隔閡，而得以心靈相通。

其詩凡三韻，首著眼雙方各懷技藝，「縱不知音意暗通」；感歎在橫濱能欣賞自己書藝的人少，言下便對女子的索書青睞心懷感激。次承此意，「春蚓秋蛇」是書法代稱，「兩京」當指日本東京與京都，日本書道亦源遠流傳；自己漂泊至此鄉，難得有佳人賞識自己的書藝。末寫離筵中乞得「女以筆譯彼國真書」，將隨身攜帶再走天涯；感歎自己與女子，一為宦途偃蹇、一為婚姻失夫，大有「同是天涯淪落人」之慨。此詩意境與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白居易〈琵琶行〉都有異曲同工之妙。《杜詩鏡詮》引何云：「序亦曲折三致」、蔣云：「序中瀏灠頓挫、豪蕩感激，便是此詩妙境。」⁹⁰梁子嘉之詩及序，亦有如此佳境。

⁸⁵ 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79 年），卷一下，〈齊物論第二〉，頁 74。

⁸⁶ 洪棄生云：「近日一位宦途老先生梁鈍庵到鹿，輟駕見訪。素昧平生，慷慨直言，謂僕駢儷佳、詩不佳；僕愕然、駭然。問何所見而云然？道自幼春處見近作一篇。僕疑之，不稔其人為工於詩者耶，抑或盲於詩者耶？姑聽之。索看小草，姑呈之。鈍翁一閱，擊節〈懷古〉及〈子夜歌〉、〈古意〉、〈無題〉諸詩，不禁目笑之；以為眼大如箕，乃僅識及少年文字浮艷體格者耶！蓋〈咸陽〉、〈姑蘇〉懷古八篇，乃逾冠時馳逐王、楊、元白體者也。及是夜留飯，鈍翁出示所作〈釣龍台歌〉，則又愛之、疑之。錄所作散行文，又有才氣；乃縱論以試之。夜深，攜去舊作陳太史、孫太守觀風文卷三本；越日送來，則黏紙眉評、尾評幾滿。」同註 3，文選·與李雅歆君書，頁 189。

⁸⁷ 梁子嘉：〈梁鈍庵詩稿〉，《臺灣詩薈》（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年）（下），「詩存」第十五號，頁 154。

⁸⁸ 《全臺詩》（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8 年），第 12 冊，梁成楠，頁 678-679。

⁸⁹ 同註 3，文選，頁 190。

⁹⁰ 清·楊倫編輯：《杜詩鏡詮》（臺北：華正書局，1979 年），卷十八，頁 1226-1229。

旅日終曲，則為一首情致深遠的律詩：

脫屨登樓著襪行，紙窗遙見雪山明。座中竹影搖花影，門外車聲雜屐聲。客為海行求翰墨，人從地震識陰晴⁹¹。異書捆載將歸去，回首烟嵐更有情。（梁子嘉〈將歸〉，1897.2.25.1）

紙窗、木屐、著襪、翰墨等事物象徵著中國與日本雙方共有的生活記憶，聯繫而成文化體系與意義。據當時王韜《扶桑遊記》：「屋宇雖小，入其內，紙窗明淨，茵席潔軟。庭前必有方池蓄魚，荇藻繽紛，令人有濠濮間想。」⁹²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園庭〉：「覆院桐陰夏氣清，汲泉烹茶藉桃笙。竹門深閉雲深處，盡日惟聞拍掌聲。」都描繪一古風猶存的日本圖景，也是回歸原鄉之中國文化象徵。⁹³頷聯的當句對，是杜詩首創，也成了梁子嘉最愛用的句式，如前：「聖人西海還東海，大局南朝與北朝」亦是。在一片視覺與聽覺意象交錯下，讓此番旅程的最後一瞥，充滿急管繁絃、曲終亂彈的風韻。頸聯上句寫自己隔海而來，又將浮海而去，臨別翰墨相贈，也算到此一遊之痕跡；下句寫此地地震頻仍，人民習以辨識天候之陰晴晦明；一由人／我，一由地／天，飽滿張開日本之行的空間，也引出尾聯：捆載行囊，回首煙嵐的收束餘音。

若再回顧出發前〈束裝有感〉一詩：衣服趙改，詩書毛錐，嫌其無用，切斷熟悉的生活文脈；而今旅日將歸：脫屨著襪、翰墨異書，似又重構一新的意義世界。是大清帝國的霸權中心傾倒破裂後，文化的有限與不完全才被迫突顯出來。而這破裂除了帝國的權力消滅之外，也是中國文化古典境界形態的破裂，是自足圓滿的境界形態，遭受西方、日本等強國實有形態文化之挑戰。中心之消解導致了邊緣之離散。在越境流離之中，或者將找尋那新的替代物以重新裹傷；因而梁子嘉流離之際的尋覓，除了是對明治維新後日本新權力的驚奇凝視外，也是對差異文化的聚焦端詳。最終在漢／和「縱不知音意暗通」的古典文藝中，重建了雙方的主體間性，找回了「干戈化為玉帛」的珍貴情誼，也挺立了自我與他者共享的天地世界。

⁹¹ 同註35，《臺灣新報》原作「暗」字，宜是「晴」字之誤。

⁹² 清·王韜：《扶桑遊記》，《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頁399。

⁹³ 鄭毓瑜：〈舊詩語的地理尺度——以黃遵憲《日本雜事詩》中的典故運用為例〉，王璦玲主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移動之文化詮釋》（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9年），頁251-292。

七、結語：遍求不死藥，醫國歸有具

梁子嘉的旅行敘述，即是在自身的流動身世、主觀的離散情境之上，又遭逢臺灣的客觀情境——歷史的主權讓渡過程中；如此在主客體的交會之下，重尋未來主體的可能性與世界的真實性。而這場重尋之旅，其實也就構成了臺灣子民的療傷之旅。

梁子嘉《日東遊草》最初是寄給時在上海的林朝崧。林朝崧以第一讀者也寫下了詩回應：

九州何太窄？無地置梁君；去矣辭鄉國，飄然逐海雲。扶桑觀日窟，弱水覓仙群；
若遇羨門子，騎龍避世氛。〈懷梁子嘉（時梁遊日本）〉⁹⁴
家本蓬萊海東住，日出咸池見鄉樹。劫灰飛到仙山來，身騎白龜且西渡。……（〈得梁子嘉書賦長句奉答〉）⁹⁵

從塵氛窘隘的九州出發，仙境一遊，脫胎換骨。可見梁子嘉之空間越境，不只是地理橫向的國際旅遊，更有超越凡塵的縱深向度。在乙未之變日治初始，如此的旅行敘述，實有無比的文化意義。而這精神向度之構成，實不只於脫胎換骨而已，更有能量回頭治療國族肉身之傷痕。所以林朝崧更寄語：

滄海橫天流，萬里落胸次；噴墨寫蠻箋，化作龍蛇字。奇哉作詩人，有此凌雲氣；
聞說騎白龜，新自蓬山至。君身有仙骨，十洲恣遊戲；自度思度人，肯與世相棄。
東行謁木公，卻返扶桑轡；遍求不死藥，醫國歸有具。海上方信佳，措手何日試？
君昔慕孫、吳，大軍掌書記。銅章七品官，空銜尚無位。棄觚二十年，未遂平生志。
鰲極陷東南，青衫餘涕淚。英雄豈終窮，天下方多事；速陳治安策，漢廷思賈誼。
（〈讀梁子嘉大令（成枏）日本紀游詩卷，賦此寄之〉）⁹⁶

此詩前半謂其旅日遊仙，其實也是尋求自度且思度人，至「遍求不死藥，醫國歸有具」，相信梁子嘉仙境一遊後，回頭要「醫國」就更有能力；因而結語說：「速陳治安策，漢廷

⁹⁴ 林朝崧：《無悶草堂詩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卷一（乙未至庚子），頁8。

⁹⁵ 林朝崧：《無悶草堂詩存》（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年），頁35。

⁹⁶ 同前註，卷一（乙未至庚子），頁27。

思賈誼」，乃促其東遊之後，當為國家朝廷再獻心力。可見梁子嘉日本紀游詩卷鼓舞著讀者林朝崧，將詩意轉向對梁回國歸位、再作棟樑的期許；《日東遊草》閱讀與回應之間，自有一種自勵勵人、健康痊癒的心靈能量在流轉。

因此我們再回顧全卷，第一首〈約人游日本久不來，賦日本一首〉詩題固已點出遊日動機；然此為表層動機，不煩探討。實則十九世紀清朝從閉關自守的局面打開後，域外旅遊之風開始萌動。光緒年間，陸續出現遊日風潮，如李圭《環球地球新錄·東行日記》（1876）、首屆駐日公使何如璋赴任日記《使東述略》（1877）、王韜的《扶桑遊記》（1879）、王之春《譚瀛錄》（1879）、黃遵憲《日本雜事詩》、李筱圃《日本記遊》（1880）等，時中國已深感外洋富強的文化衝擊，這些越界的域外旅遊，蛻去了以往對異域殊方的想像傳說，對於文化差異也進行比較論述。可以說在這個「大敘述」語境的時代，域外遊記也不再如古典文人只限於域內景物意境的觀照視野，而是有了更龐大的意義脈絡，更磅礴的氣勢格局。⁹⁷而正由於是集體熱潮，「文化無意識」乃隱藏於其中。唯梁子嘉遊日在中日戰敗之隔年，時間敏感；日東一遊，關涉其國族認同之堅定守舊或移動變化之過程，旅遊敘述中「國族療傷」的深層無意識更透顯而出。

因而梁子嘉必需以敘事而非只隱喻來書寫，因敘事可以建構欲望的實質以迫近實在。我們若再回顧前言所論及：傷痕書寫不斷地返回那創傷的現場，讓書寫時的「此在」與創傷的「實在」構成了隱喻系統。但是，除了重複返回的隱喻之外，「傷痕」也往往形成一種動因，促成寫實敘事的模仿論述。⁹⁸因為在檢視傷痕的同時，記憶被喚醒，一個隱含的敘事於焉成形。⁹⁹由傷痕而來的敘事，指向時間的流程，也指向一個矛盾的欲望——重揭記憶、返回過去，或抹消記憶、迎向未來；在此時間的重新型塑中，既具有追憶創傷的軌跡，也兼有傷痕療治的意義。梁子嘉在乙未隔年，直訪暴力主動者的國度，突顯了傷痕與療癒之間的行動欲望；他是以「旅行敘述」來型塑受傷後的时间歷程，從而達到國族療傷的文化論述。

當文本影響了主體，影響了世界，這便已然是使創傷療癒的果效。關於敘述，利科（Paul Ricoeur, 1913-2005）曾提出三層模仿：文本之前的行為為「前結構」，文本之中的行為為「結構」，文本之後的行為為「重塑」，「重塑」在讀者根據情節觀照其自己世界時發生。¹⁰⁰

⁹⁷ 楊雅惠：〈郇城與東京：李春生《東遊六十四日隨筆》中的「日本」書寫〉，劉石吉等編：《旅遊文學與地景書寫》（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人文中心，2013年），頁217。

⁹⁸ **Erich Auerbach**, *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trans. Willard R. Trask,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chap. 1. p.3-23.

⁹⁹ 王德威：〈傷痕書寫，國家文學〉，《一九四九：傷痕書寫與國家文學》（香港：三聯書店，2008年），頁8。

¹⁰⁰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vol.I, p.53.

若以此來理解梁子嘉《日東遊草》的旅行敘述，遊日之前臺灣社會普遍的創傷表述，是「前結構」的社會行為，梁子嘉從「聖人西海還東海」時空矛盾之抉擇，對於日本「未到吾能夢見之，神山縹渺海迷離」，雖是其想像界的自我抒情，也是一種巨變後遠遊之前的前結構行為，是中日兩帝國衝突後的殘餘，讓他迴避了創傷現場，卻朝向那更遠處的夢中彼岸。而至於本文之中的「結構」行為，敘及「殷勤物色風塵際，儻有遺民說舊明」時，梁子嘉移動了敘述主體的比興空間，嘗試著由中國的象徵界去比擬日本，甚而以「華夷變態」的倒錯鏡象，反思中日間的關係；至「落盡旁權始自王，千年舊國變新章」時，梁子嘉透過詠史時間的互涉，讓漢、日兩脈的歷史時間交叉，敘述主體的象徵界時間也因此顯得視域多重而景深錯綜；最終敘至「我操翰墨汝絲桐，縱不知音意暗通」時，達到了漢、日文化的主體間性重建。而詩成之後第一讀者林朝崧「遍求不死藥，醫國歸有具」的賦詩迴響，則更是文本之後的「重塑」行為，映證了梁子嘉此行乃是創傷之後尋求療傷的越界之旅。本文論旨可以表列如下：

話語系統 時間歷程	旅行	敘述	療傷	《日東遊草》結構
前結構	行前	前奏	創傷記憶	感傷與夢想的矛盾
	啟程	序曲	新生欲望 抹消過去	進入他方的想像
結構	拓展視野	發展	面向未來	比興空間的移動
	深入闡釋	轉折高潮	詮釋過去	詠史時間的互涉
重塑	融合自我他者	衝突解決	傷痕醫治	主體間性的重建
	賦歸	尾聲	痊癒	醫國歸有具

梁子嘉或者並不以時間的「遺民」自許。與洪棄生相比，洪棄生固守舊有的歷史，抗拒新到的時間，其逆時序、抗天命之感甚強；梁子嘉則立於時間的浪濤上，在過往與將來的浪頭交錯中，他就一躍而過攀上另一高潮，接上了實在的時間軸。然而他必做一空間上的「移民」（旅人），與丘逢甲與林朝崧等的避居故國相比，其居停位置的越境遷移，更改變了其身體週圍的物色氛圍，進而改變了情境與心境。

相較於洪棄生、丘逢甲之於詩藝中展示傷痕，梁子嘉的旅行，卻是種開啟實在界的探險之旅。他不是在原點的時空中舔舐傷痕，而是移動了時空，遷移了心境，朝向實在界探勘，藉此以達成療傷的真實果效。因此不管是時間的綿延／斷裂，空間的移轉／隔絕，我們都看到梁子嘉轉喻式的行吟、國族療傷的敘事。畢竟傷痕的再呈演對於受傷主體而言，是一太過切身逼近而不堪回首的事；在其他主體上的類似經驗，或可在一安全的審美距離中重新觀照。因此他不是以「現在此時之我」對「過去彼時之我」的回憶，而是越過主體界線下——以「處境類同之我」對「獨自受傷之我」，以越境之大我對舊有之小我——所

進行的療傷，這兩主體不再只是時間上的前後，更是空間上的類比或類似，如自古以來的空間相鄰、同苔異岑、同文異種的日本，以至於今日的位置相似、地位相等的弱者朝鮮、或其他東亞的弱者。他也並未讓過往受傷的主體再次現身，而是透過旅次流轉諸多關係的建構，營造出一種類似的情境，再由此中抒情與省思。也可說在這越境凝視時，他就凝神出了一準主體，這準主體在新情境下透過書寫，重新安排了是非善惡，重申了曲直正義。——正是異地新國之旅，讓梁子嘉思索了自我的生命、存在的依託、國祚的斷續、天地的開翕……。

徵引文獻

古籍

- 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史記》（臺北：藝文印書館，2005年）。
- 漢·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6年）。
- 劉宋·范曄：《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
- 唐·房玄齡等：《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
- 唐·魏徵等：《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
- 宋·李昉等：《文苑英華》（臺北：大化，1985年）。
- 元·脫脫等：《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
- 清·王文誥、馮應榴輯注：《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清·王韜：《扶桑遊記》，《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
-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79年）。
- 清·黃宗羲、全祖望編：《象山學案》（黃氏原本、全氏修定），《宋元學案》（臺北：世界，1991年）。
- 清·聖祖敕編：《全唐詩》（臺北：世界書局，1988年）。
- 清·楊倫編：《杜詩鏡詮》（臺北：華正書局，1979年）。

近人論著

- 王孝廉：《島國春秋——日本書紀》（臺北：時報文化，1988年）。
- * 王德威：〈傷痕書寫，國家文學〉，《一九四九：傷痕書寫與國家文學》（香港：三聯書店，2008年），頁7-74。
- * 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臺灣文獻叢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
- * 全臺詩編輯小組：《全臺詩》（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8年）。
- 朱雲影：〈中國正統論對於日韓越的影響〉，《師大學報》第11期（1966年），頁319-340。
- 李漁叔：《魚千里齋隨筆》，《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第83輯。
- 林朝崧：《無悶草堂詩存》，《臺灣文獻叢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
- * 林朝崧：《無悶草堂詩存》（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年）。
- * 林資修（幼春）：〈梁鈍庵先生傳〉，《臺灣詩薈雜文鈔》（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6年），頁20-21。

- 洪棄生：《瀛海偕亡記》，《臺灣文獻叢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59 年），第 59 種。
- * 洪棄生：《寄鶴齋選集》，《臺灣文獻叢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 年），第 304 種。
- 夏恆翔、孟憲仁：〈從語言化石看吳越人東渡日本〉，董楚平：《吳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293-309。
- 徐特立、邵循正等編：《中日戰爭》，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
- 倪梁康：《胡塞爾現象學概念通釋》（北京：三聯書店，1999 年）。
- * 梁成枏著，連雅堂輯：〈梁鈍庵詩草〉，《臺灣詩薈》第 9、10、11 號，（1924 年 10-12 月），頁 13-16、頁 13-16、頁 9-12。
- 連雅堂：《臺灣通史》（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2 年）。
- 連雅堂：〈鈍庵詩草序〉，《雅堂文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77 年），卷一，頁 47。
- 連雅堂主編：《臺灣詩薈》（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年）。
- 連雅堂主編：《臺灣詩鈔》，《臺灣文獻叢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97 年）。
- 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 年）。
- * 楊雅惠：〈郇城與東京：李春生《東遊六十四日隨筆》中的文化想像〉，劉石吉等編：《旅遊文學與地景書寫》（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人文中心，2013 年），頁 215-242。
- * 廖振富：〈飄泊與定根：晚清旅臺詩人梁子嘉及其作品初探〉，《臺灣古典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晚清到二二八》（臺北：國立編譯館，2007 年），頁 13-53。
- * 《臺灣新報》（臺北：臺灣新報社，1944 年）。
- 廣成子：《日本史記》〈豐臣秀吉本紀〉。見網頁：
<http://zh-classical.wikipedia.org/wiki/%E8%B1%90%E8%87%A3%E7%A7%80%E5%90%89>
（2013 年 6 月）
- 鄭毓瑜：〈舊詩語的地理尺度——以黃遵憲《日本雜事詩》中的典故運用為例〉，王璦玲主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移動之文化詮釋》（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9 年），頁 251-292。
- （日）川口長孺：《臺灣鄭氏紀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 年）。
- （日）石村貞一編：《國史略》（東京：東生書館，1883 年，明治新刻第 3 版）。
- （日）岩垣松苗編：《校正國史略》（京都：五車樓，1874 年）。
- （日）林羅山：〈神武天皇論〉，《羅山林先生文集》（京都：京都史蹟會，1918 年），卷二十五·論下，頁 280-282。
- （日）倉野憲思校注：《古事記》（東京：岩波書店，1997 年）。
- （日）鈴木知太郎編：《小倉百人一首》（東京：櫻楓社，1930 年）。
- （日）齋藤正謙：《海外異傳》，《鄭氏關係文書》（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附錄。

Auerbach, Erich, trans. Willard R. Trask, *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Freud, Sigmund, *The Standard Edition*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London, 1963) Vol.XVI, Vol.XVIII.

Miller, Joseph Hillis, *Reading Narrative* (Norman: 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1998).

Paul Ricœur, *Time and Narrativ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vol.I.

DOI: 10.7208/Chicago/9780226713519.001.0001

(說明：徵引文獻前標示 * 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Hong, Xu (Qi-sheng). *Anthology of Ji He Zhai, Encyclopedia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Taipei: Economic Research Department in Bank of Taiwan, 1972.
- Liang, Cheng-ran. "Poems of Dunan", in Lien Ya-tang (ed.) *Collection of Taiwan Poetry*, number 9-11, (1924.10-1924.12), pp.13-16 、 pp.13-16 、 pp.9-12.
- Liao, Zhen-fu. "Wandering and Stay : The Poet Liang Zi-jia in Late Qing and his works," in *Vestiges of the Era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in Taiwan: From Late Qing to the 28th February, 1947* (Taipei: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2007), pp. 13-53.
- Lin, Zhao-song. *Poems of Wu men cao tang*. Taipei : Long-wen Press, 1992.
- Lin, Zi-xiu (You-chun). "Mr. Liang Dunan Biography," in *Essay notes on the Collection of Taiwan Poetry* (Taipei: Economic Research Department in Bank of Taiwan, 1966), pp. 20.
- Qiu, Feng-jia. *Poems of Ling Yun Hai Ri Lou* (Taipei: Economic Research Department in Bank of Taiwan, 1960), *Encyclopedia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 Taiwan Poetry*. Tainan: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 2008 .
- Taiwan's New News*. Taipei: Taiwan's new newspaper , 1944 .
- Wang, Der-wei David. "Scars Writing , National literature," in *1949: Trauma writing and National Literature* (Hong Kong :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pp. 7-74.
- Yang, Ya-hui. "Zion and Tokyo : The Japan Writing in *Essays on the Voyage to The East for Sixty Four Days* by Chun-sheng Li," in Liu, Shi-ji et al. (eds.) *Travel Literature and Landscape Writing*. (Center for the Humanitie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2013), pp.215-542.

Spatial and Temporal Transboundary, National and Ethnic Healing: Travel narrative in Liang Zi-jia's *Tourist Poems to Japan* (日東遊草) during the beginning of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Yang, Ya-hui

(Received July 10, 2013; Accepted October 20, 2013)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aiwanese classical poetry *Tourist Poems to Japan* (日東遊草) written by Liang Zi-jia (梁子嘉) during the beginning of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n the poetry, it explores the cultural distin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the emotional vision and blur of the Chinese classical poets when they confronted Japan, the new empire in East Asia. Since the time of Liang's transboundary travel is after Sino-Japanese war, the next year of the cession of Taiwan to Japan, the significance of nation-healing action was highlighted. In Liang's Poems, he describes the scenery of port city, Japanese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All lyrical imagination and aesthetic visualization, or intoned to history and sense on the times, make us think about th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s either in geographic imagery, or spatial and temporal awareness between Liang Zi-jia who travelled to an exotic country, and the abandoned adherents who stayed in Taiwan, and the exile emigrants who fled to Mainland. We also probe that how Liang Zi-jia reflected on the disputes between Japan, China, and Taiwan, through the transboundary travel, in order to heal the trauma from the nation defeat situation.

Keywords: Liang Zi-jia (梁子嘉), *Tourist Poems to Japan* (日東遊草), travel narrativ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healing